

国开始转变对朝鲜的方针。一方面批判在对外工作中“大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一方面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见面，主动承认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的错误，并提出让驻朝志愿军40万人全部撤回回国，又派彭德怀去当面向金日成道歉。

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对金日成在朝鲜的实现绝对独裁的统治予以承认和支持，金日成则在朝鲜开始全面学习中国，从而开启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中朝关系的确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古代中央“上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或可称之为蒙着革命色彩的最后的“天朝”。

第一部评论

下斗米伸夫（法政大学）

期待已久的畏友沈志华的大作《最后的“天朝”》完稿，并已由朱建荣译成日语出版（岩波书店），笔者对此感到不胜欣喜。

此书尤其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就1956年震惊中朝乃至莫斯科的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给出了全新解释，堪称新的标准解读。其原因在于，沈著对毛泽东策划扳倒金日成这一通俗说法，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史料加以反驳、纠正。仅史料一端，已令人耳目一新。这诚可谓沈氏孜孜求索国内外档案的辛劳成果。

自1956年8~9月该事件发生，至1958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其间的中朝关系，同样也是开始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危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鲜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其政治危机乃是关系到中苏安全保障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纵非如此，等级关系与危机管理本就是同盟的关键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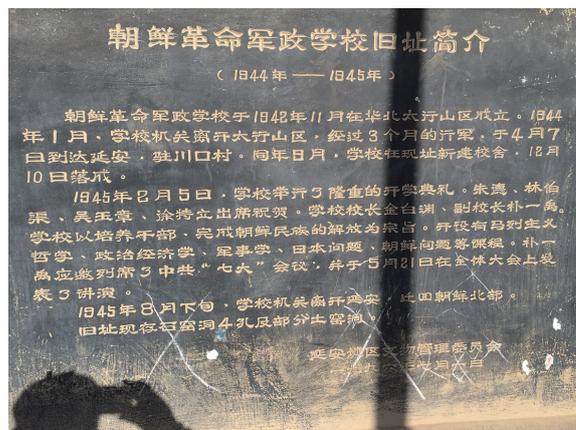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红军25军原定在朝鲜与日军正面交锋，未料战争结束早于预想，苏联占领了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亟需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在莫斯科负责应付占领地事务的斯蒂科夫大将（大使，日丹诺夫之婿）等人创设了执政党，即劳动党。日语翻译科维仁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выженко，于东京任职后，就任苏共日本科长）等所在的第七科又将驻哈巴罗夫斯克苏军翻译金日成（金圣树）推为新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先后领导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等同盟国对策事务实质上由日丹诺夫、米高扬负责，1957年起则由安德罗波夫接管。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中苏是否承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虽有争议，但直到毛泽东、金日成出席195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为止，中苏在亚洲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苏联负责战略问题，亚洲战术指导部则设在北京。对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也包括在内。

中苏、中朝关系亦在这一框架之中。以笔者拙见，1955年乃是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同年4月末，金日成以南下统一之方针，携将北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劳动党新纲领案，秘密访问莫斯科。然而持和平共存论的苏联非但否定了该提案，更批判金搞“个人崇拜”，要求朝鲜比照苏联的集团领导，划分党与政府的权限。金一面回应称未来将推举崔庸健为首相，一面却在12月借文艺政策，批判掌控党内组织的亲苏派，鼓吹“我们式”主体思想。对此，亲中派亦表支持。

1956年，崔出席了苏联共产党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亦出席了第三次劳动党大会。然而，至八月事件发生为止，亲中派党员开始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在推翻金的谋划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此看来，亲中派党员是在知会苏联大使馆后开始行动的，与中国的意向并无关系。

另一方面，结合1955年末苏联的动向来看，便可知苏联对这一行动未必持欢迎态度。前文曾提及的科维仁科与米高扬、彭德怀同入平壤（亦因如此，他当时并未触及日苏和平条约交涉），在他看来金日成的党内权力已



经得到了强化，同时平壤对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印象并不佳。

正值此际，东欧爆发骚乱，中苏不得不搁置朝鲜，着力应对共产党权力垮台的危机。金日成因此逃过一劫。其后，1957年莫斯科更发生了一场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的反党政变。该政变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反将一军，以反党分子名义，肃清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中央主席团成员。次年赫鲁晓夫兼任总理。至此，苏联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理论根据，与其在平壤的影响力同样不复存在了。

第二部〈民众·集体·国家〉

当代中国民间书信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初探

张乐天（复旦大学）

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

解放以后，中国农村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数亿农民的生产、分配都必须详细记录；另一方面，中国曾经开展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检查交代等文字资料。中国因此成为生产民间资料最多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实反映群众实践的社会生活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更没有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社会生活资料被丢弃，被送进了造纸厂。

我从1988年开始搜集农村资料，主要集中搜集浙北联民村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料，就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而言，我目前搜集的浙北联民村的资料是一个村最完整、全面、丰富的资料，已经建成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提出“抢救资料”的任务，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一切流入于民间的手写资料与非正式资料”。这个建议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1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搜集资料的工作是困难的。我们摸索着通过各种途径从社会上搜集资料，慢慢地摸清了社会上资料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数量巨大的社会生活资料。

二、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资料简介

所谓“社会生活资料”，包括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所制作但没有纳入正式档案系统并流入到社会上去的资料，包括家庭与个人写作的资料。这类资料十分具体、充满细节、直接涉及人的日常行为，而且90%以上都是手写的材料，成为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的难得资料。

近6年来，我们搜集涵盖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的近20万件社会生活类数据、文书资料，初步构建了以长江流域社会生活资料为核心的馆藏资料体系。另外，还收集到超过31万封来自民间的手写信件，以及3200多本日记和工作笔记。下面简单介绍这些资料的情况。

数据资料：

1，10多个生产大队的详细、完整的会计、统计资料，更宝贵的是，5个生产小队会计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一个农民的每天的活动安排，数千个家庭几十年的经济收入与分配。

2，数十种具有数据分析潜力的宝贵资料，例如，某市1950年代完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江西某地区1950

